

## 第七章 結論

唐代初期的八分書在書壇上並不出色，很難與初唐楷書相提並論，當時書家以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為最著名，被譽為「初唐四大家」，加上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偏愛和提倡，致使書壇上學習王書蔚為時代風尚。初唐的八分書就在這種二王典範的聲浪中，顯得格外的平淡與遜色。初唐分書的發展正如葉昌熾所言，明皇以前為石經舊法，明皇以後為帝所創之新法。當時的八分名家以歐陽詢、殷仲容、薛純陔為主，他們皆是承襲北方分書的特色。這種北方分書的傳統，是沿續東漢《熹平石經》歷經魏晉、北朝到唐初歐陽詢有著明顯的承遞關係，它的書法以方筆為主，表現出骨力洞達，具有北方粗獷、雄強的氣質。

武周時期的八分書才有新的變化，這時社會上書家隊伍擴大，並產了一些著名於世的八分書家；尤其武周後期的八分重新回歸東漢的脈絡，這時期的書法已脫離初唐隸楷的影響，它的書法風格首先表現出南北融合之後典雅秀麗的書風，其次又受唐代尚法的影響，呈現出工整端莊的風度，形成既有南朝莊重典雅又有北朝剛健樸實的時代風格。武周時期書法的特色正如葉昌熾所形容「自中睿之際廬藏用分書，若紀信、蘇瓌大通禪師等碑，已先變歐法」，此時期的書法漸漸走上精美流麗，法度增強的趨勢，端莊秀雅而不失質樸，漸漸回歸東漢隸書的傳統，波磔呈典型的蠶頭雁尾，點畫兩端厚重豐滿，穠纖適度，極具華滋精麗之美。

盛唐八分書的繁榮景象表現在書家輩出和帝王的積極提倡。當時社會上善八分書家眾多，從著錄上的記載，開元天寶時期八分書家龐大，並非如一般所言的只有唐玄宗、韓擇木、史惟則、徐浩等盛唐名家，這些書法家雖然不像盛唐八分名家有顯赫的書名，但他們努力追求恢復古法，才能創造出中國書法史上第一次較有規模的復古運動。另外著錄上也記載，當時的八分書碑刻數量最多，甚至超過唐代楷書體碑刻，使得八分書的碑刻在唐代首度占有優勢的地位。除此之外，

我們從出土的八分碑刻作品統計，也是以開元、天寶時期八分書出土的碑誌占全數的一半左右，顯示當時的社會「豐碑大碣，八分書居泰半」八分書的盛行與當時社會瀰漫著一股復古的情懷有關，在當時文人的詩歌中，大都抒發詩人的藝術觀感和復古情懷，滲透著那一代人們所嚮往的藝術園地。從杜甫的詩〈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我們不難體會出他們極力讚揚繼承秦篆、漢隸。自許為繼承秦漢書法的正統，杜甫親見當時復古的流行盛況，他形容八分書在那時文人眼中「一字直百金」。從他的詩句中「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絕不聞」，我們不難看出杜甫對蒼頡以來，漢字演變歷程中的幾代書家獨鍾李、蔡二位，那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小篆、八分書才是古法的源流。這種推崇篆、隸復古的目地是想為當時「頹廢」的書風找回一種古典的規範和範籌。

唐玄宗對盛唐八分書的主要成就，首先是確立盛唐審美的新風貌，唐玄宗的書法偏好豐腴肥厚，這種豐腴的書風在當時形成一種新的審美時尚。初唐書法強調瘦硬剛健，到了盛唐時期書風一變，瘦硬被豐腴所替代，究其原因受了唐玄宗的影響。李隆基的書法呈現豐腴雄壯之態，臣下仿效便蔚為風氣。從唐玄宗的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如《鶴鵠頌》、《紀泰山銘》、《石臺孝經》等，這種豐厚飽滿之書風在開元、天寶時期的書壇上呈現出明顯的藝術風格，尤其在盛唐名家徐浩、史惟則等人的作品展露無遺，他們的作品與初唐書法清秀剛健之氣漸漸拉遠距離。

唐玄宗在書法藝術上的另一貢獻是提倡唐代八分書的新風格。明皇以前唐代初期的八分書以歐陽詢為代表，這種分書承自漢代《熹平石經》的舊法。到了玄宗的時候書法風格已變化而成為另一種新特色，唐玄宗八分書的特色大都結體趨於漢隸方扁的韻味，同時筆畫豐腴圓潤。又加上強調波挑，使字形左舒右展，具有分張外拓之勢，形成既典雅又雍容華貴的盛唐新書風。唐玄宗的八分書對當時影響很大，如史惟則、徐浩。韓擇木，還有其他盛唐名家如李潮、顧誠奢、張芬等人，形成宮廷內的書家趨從皇帝的書法，熱心於八分書的實踐，我們不難想像

到盛唐八分書固然得力於韓、史、蔡、李、顧等人的努力，但卻應歸功於李隆基的提倡。

唐玄宗在藝術上的另一成就即是他擢拔不少八分書家進入集賢院與翰林院形成一個「宮廷的書家集團」，這些書法家進入宮廷的主要職務擔任皇帝、與太子的侍書活動，並且奉皇帝的敕命書勒碑誌，講論書道，並搜訪古跡書畫，鑑定真偽。他們活動於帝王身邊，形一個御用書法的集團，這些御用書法家受帝王的影響皆擅八分書，以八分書寫碑誌，並使這種風氣延及天下。總之，唐玄宗在八分書的成就體現於他開啓盛唐新的審美觀點，和提倡唐代八分書新風貌，並擢拔不少八分書家進入集賢院與翰林院行成一個「宮廷的書家集團」，進而帶動社會上的八分書潮。唐玄宗之所以提倡復古的漢魏書法，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些關聯。

他面對社會上道德敗壞，俗風且行，決心返朴歸淳，弘揚儒學，恢復儒家的社會地位，所以標舉堯舜之道統，積極弘揚儒學。唐玄宗希望回復到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的理想國，在他的詔文中他對堯舜極盡歌頌，尤其玄宗對中國「尚古」的傳統懷有一種很高遠的理想，將堯舜、孔子作為自己政治理想的最高體現者，這正是玄宗所要遵循的傳統，所以他在開元初年推動一系列的文化措施，包含弘揚儒學，親注孝經、道德經，並重新訂立禮樂制度等，這些措施都是玄宗標舉恢復中原道統的決心。在書學方面他也同樣地追求回復中原古法的傳統。唐玄宗之所以提倡八分書是因為他感到當時：「俗風且行，舉國相效，迷游忘返」所以他追跡上古，實行堯舜之風，興盛漢魏書法，希望能夠「導彼迷津，歸于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讓人民能夠潛移默化於古法中，重振以古典渾厚的漢魏書法。

至於盛唐八分書的書法特色，它雖然承自漢隸，但與漢隸風格明顯不同。它在結體和筆畫上繼承了漢隸的技法。卻有它獨特的風韻，往往筆畫豐腴渾厚，出筆挑、趯明顯，並且加強撇、捺、勾等主要筆畫，使字體嚴謹勻稱，更加靈動飛揚，增加了藝術效果。尤其盛唐八分書在形成自己的特色過程中，不管在受漢隸書法，魏晉書風，北齊書法的影響乃至篆籀古法的復興，都有承自古代的書法，

並且加以創造新的書法特色，形成飄逸誇張，典雅飾美，雄強樸茂，豐厚圓靜的書法風貌，而這些新書風又給盛唐八分書注入新的生機，從而形成一個繁花似錦多彩多姿的書藝百花園。相較於漢代的隸書而言，在書法藝術史上這無疑是一次新的文藝復興，不但具有重大的意義與改革，而且在曹魏西晉分書的基礎下，回歸漢法並產生了篆籀古法的復興，使幾乎失傳的中原古法又重回藝術的舞台上繼續散發光芒。

盛唐八分書的衰微與國家政治敗壞，帝王書法品味的改變，社會審美的變化皆有直接的關聯。安史亂後，李唐皇朝盛況已不如往昔，隨著政治、經濟的敗壞，皇帝士人對書法的關心也已經大大降低，雖然此時帝王威權下降，李唐皇室在書法的社會已不再似太宗、玄宗那樣占有優勢的影響力。玄宗之後的帝王大多以行楷書體為風尚，使得玄宗所提倡的八分書後繼無人。朝廷中缺乏帝王的支持，八分書在文人雅士的社會中就很難恢復舊時的盛況。帝王喜好書風的轉變，是導致盛唐八分書沒落的重要因素。

社會上書風的轉變也是盛唐八分書沒落的原因之一。肅、代時期的社會書風，為承續開元、天寶時期八分書的繁榮，但社會上擅八分書家已有減少的趨勢。德宗之後的書法社會出現了重大的轉折，隨著這些書壇大家如徐浩、韓擇木的相繼去逝，八分書家的銳減又缺乏帝王的支持，使得八分書風急遽凋零。從前文碑刻書體的統計，此時的八分碑刻亦由盛轉衰，書體的應用則又迅速地恢復楷書的舊風。在肅代之後中晚唐的書法大致沿著顏柳楷書與草書這兩種書風而繼續發展。晚唐的政治已是日薄西山，內憂外患戰事不斷，面對殘破不堪的局勢，文人士大夫已喪失了建立功業的信心，代之而起的是悲觀消極的情緒。此時的書法風氣已經失去了盛唐那種宏大、開闊、壯觀的風格。又加上晚唐禪學興起社會上發展成另一種書風，代之而起的是狂放不拘的草書僧的書法特色。由貞元一直到唐末，書法社會的規模已漸漸日益衰微，在德宗和憲宗時期，知名的書家尚多朝中之士。到了長慶以後地方性的處士書家和釋僧書家逐漸抬頭。至大中以後，則知名的書

家人物多屬釋僧，或中下階層的士子。總之，隨著人們審美觀念的演變，人們不再滿足於傳統的篆隸書風和二王書法；中晚唐草書僧的崛起，就是因為社會上追求別開生面，變盡古法的風貌。這些因素導致盛唐八分書不再成為書壇上的主流派。

隨著年代的久遠，又加上唐代存世書蹟非常稀少，現存作品除了幾位名家之外，對於當時享譽盛名的書家作品幾乎沒有留存。這些因素致使後人對盛唐八分書往往以偏頗的角度來評論它的特色，例如清·王澐認為「隸法自鍾繇《勸進》、《受禪》二碑，已截分古今，不復漢人渾噩風格」<sup>1</sup>清·楊賓更明確指出：「八分之俗，肇韓擇木。」<sup>2</sup>清代的葉昌熾則提出較客觀的見解認為：「唐承漢、魏之後，分書宏偉，猶有古法。」又「唐初分書，承北朝用方體。明皇變以扁體，海內靡然從之。韓、梁、史、蔡，其體大同，所云唐隸也。」近代學者傅申則肯定唐隸為「隸書的第一次重要的復興；同時認為唐隸的發展在書法史上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及影響」。<sup>3</sup>啓功更推崇盛唐八分書的藝術成就，他評論：「正始以來論篆隸，唐人畢竟是中興」，又讚揚唐代八分書是「中經六朝，至唐人始遙接典範。」<sup>4</sup>隨著考古資料的出土，盛唐八分書重現世人的眼前，過去對於它的偏頗誤解自然迎刃而解。綜合上面敘述，從宏觀的角度來探討盛唐八分書，它的特色是在曹魏西晉書法的基礎下回歸漢魏古法，遙接中原典範；換言之也就是唐玄宗提倡八分書標舉自漢代以來，歷經曹魏、北齊、隋代書法一脈相承。唐玄宗提倡北方書法以古典渾厚為準則，正如唐太宗標舉南方書風以王羲之書法為典範，也唯有如此他才能擺脫二王書法的樊籬，在書史上開創另一個天地。

<sup>1</sup> 清·王澐，《虛舟題跋》，跋《漢將紀信碑》，《叢書集成續編》97，臺北：新文豐出版，1989年，頁103。

<sup>2</sup> 楊賓，《大瓢偶筆》，《鐵函齋書跋》，臺北：新文豐出版，1979年，頁848。

<sup>3</sup> 傅申，《海外書跡研究》，1987年，北京：紫禁城出版，頁27、28。

<sup>4</sup> 啓功，《論書絕句》，香港：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80。

